

认识命运 争回尊严

——评马尔罗的《人的状况》

冯寿农 吴 冰

1933年,马尔罗发表了《人的状况》这部悲壮的英雄史诗式的小说。作者叙述刚刚发生在六年前的中国“四·一二”事件,倾注了作者对中国革命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切同情。引人入胜的东方题材,气势磅礴的斗争场景,细入的哲理思辨,受到法国读者的好评,当年就获得龚古尔大奖,奠定了马尔罗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表层上看,这部小说似乎是对1927年中国革命的叙述。其实,更重要的是那迸发于字里行间的思想火花。马尔罗不仅表现出一个文学家的才华,更表现出一个哲学家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他借助中国革命的题材,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融入文学作品中,影射三十年代法国不安、迷茫、徘徊的社会,营造一个人类普遍存在的荒诞、艰难的处境。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带有其普遍性和象征寓意,他以独特的观点解读中国革命。

—

文学批评要真正做到科学、客观,首先要立足于文本的内部批评,从文本表层的语言形式入手,揭示文本的语言独特性。雅各布森于1921年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著作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①杨·穆卡洛夫斯基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作品的文学性“在最大程度上突出表达,亦即突出‘表现’和‘语言本身’。”^②小说是用语言写成的,首先是语言的文学、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独特性就是语言的“突出表达”。曾担任过文化部长的马尔罗一生酷爱艺术,在文学创作中对语言艺术字斟句酌,千锤百炼。因此,首先从表层语言入手,随后进入文本深层结构,揭示小说的含意和马尔罗的哲学思想的内核。

阅读是批评的第一步,阅读活动是一种审美活动。克罗齐说:“审美的事实就是形式,而且只是形式。”^③我们在阅读马尔罗的原著《人的状况》的过程,明显地感受到文本语言简练精到。

马尔罗喜欢用名词性短句描述背景和氛围,如在小说的第一节里,陈已完成了杀人的使命,惶恐不安地出现在街上,但这是怎么样的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生命,没有任何人迹,没有任何声音传来,甚至听不到小商贩的叫卖声,看不见被遗弃的狗的影子。”在这里,作者运用了“aucun”和“pas-même”两个词组的反复,从而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世界生存世界的荒凉、寂寞与孤独。又如如在原作的第16面,作者惜墨如金,仅用两个名词描述深夜上海的街头的情景:“Abandon et silence”(孤零、寂静),简单的两个名词以其简练、朴实、高度的概括描述了陈的心境和万物寂然的情景。在激战的过程中,房间里浸透了汽油的残存物,被手榴弹点着,起火了。在这

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竟然没有水用来扑灭大火!作者仅用两个词传达这一信息:“pas d'eau”(没有水),不会再有哪个表达法能比它们更简练的了,不会再有哪个表达法能比它们更能传递绝望无奈的心情了。句子的简单利落与战事的紧张激烈互相吻合,任何繁冗拖沓的表达都会歪曲实际的内容。除了名词性短句,还有形容词短句、动词性短句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短句称为“原子短句”。马尔罗非常喜欢用三拍节奏,使文字铿锵有力,产生一种诗的韵律。例如,共产党员卡托夫视死如归,勇敢地走上刑场,狱中的其他难友目送他离去。作者写道:“所有的脑袋都跟随着他迈步的节奏一上一下地点动着,充满了爱慕、恐惧、屈从之情。”在这里,三拍节奏使这一句子读起来,含有一种像唱圣诗的声调一样的悲壮。朗读马尔罗的原作,深深地感到那种和谐的节奏把他的哲理思想、人物形象、和音乐韵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雄浑的史诗、悲壮的交响乐。

二

索绪尔认为,自然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动机性,是任意性的。然而,我们同样感到,在文学世界里,文学语言似乎蕴含着一种模糊的动机性,能指和所指之间似乎存在某种难以言传的联系,因为作者似乎在形式与内容之间试图建立某种象征的联系。我们的批评重视文本的语言表象,抓住语言的独特性,然后寻找语言的象征意义,把语言当作一个敲门砖,敲开大门,进入神奇的文本内容世界。

“原子短句”究竟象征什么?这一语言表象究竟和文本的内容有何联系?我们在第二遍阅读原著的过程中,借助于主题批评法,又凭着审美的直觉发现了循环出现的主题和其子题。

主题在文本中的反复出现体现了作者意识的倾向性,是作者的潜意识的投射点。里夏尔说:“一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形成作品的无形构架,大概它能给我们提供打开内部组织的钥匙,这些主题在作品中最经常得到发挥,以一种可可见,不同寻常的频率复现在作品中,在此处或彼处的重复出现表明一种萦绕在作者脑际的念头。”^[1]在马尔罗的《人的状况》里,引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个在文本中频繁出现的词:孤独。孤独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联想到文本的语言表象“原子短句”,它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象征的关系:“原子短句”通常是一个独立的句子,甚至由一个词或一个短语构成,不枝不蔓;而在人世间,芸芸众生,孤立无援,无依无靠。我们隐隐地感觉到“原子短句”首先象征人的孤独。在“人的状况”里,人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是无法交流的。陈刺杀了军火商唐寅塔后,来到吉索尔家里。自从陈的双亲去世后,吉索尔便成了和陈相依为命的人。陈对他说:“我感到特别孤独。”陈好象与他的革命同志“十分疏远似的”,在战斗中,他觉得比任何人都孤独。陈在精神上毫无依托,曾经抚养过他的史密森牧师要给他寻找一条心灵的拯救道路,但他拒绝了。乔是上海工人起义者的领袖,在起义前,他来到汉口向共产国际代表沃罗金汇报,沃要上海共产党放下武器,把武器交给国民党,放弃起义。他的起义队伍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感到孤立无援。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孤独,而是感到“与宇宙的联系断裂了”。人的生存是孤独的,在死亡面前更感到孤独。乔的战友、共产党的领袖卡托夫在被押送刑场前,他也觉得孤独,“觉得自己被人遗弃了”。智睿的哲学家吉索尔也“焦虑不安地感觉到,自己正处在一种别人不能介入的孤独之中,任何人也休想再见到他。”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弟子陈和自己的儿子乔的思想一无所知,跟他们是“多么遥远”。

在马尔罗看来,人永远生活在孤独之中,但是人总是力图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人一旦清醒地意识到孤独,就会产生焦虑不安。在《人的状况》的原著中,l'angoisse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中译本里,被译成了不同的意思,看不出其频繁出现。这个循环的主题正是马尔罗潜意

识在文本表层的体现,是作者思维活动在文本上的沉淀。马尔罗所要揭示的是现代人的一种心态、一种生存的恐惧,反映人在生存面前表现的困惑。焦虑不安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象一个魔影一样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20年代上海恶劣的环境给马尔罗提供有力的证据用来诠释人的生存状况,在这座工业最集中的城市里,“就在这些墙壁的后面,藏匿着五十万人;纱厂里的人,自童年时代每天就工作十六个小时的人,患溃疡病、脊柱侧凸病以及食不果腹的人。”“千百万卑微的生命被另一种生命压得透不过气来。”马尔罗特意在小说中营造一个黑暗的氛围,象征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小说的主色调是黑暗,在原作329页中,有201页所描述的情节发生在黑夜,黑暗的自然环境,黑暗的社会场景。借助于黑夜,营造了一个不安、恐惧、孤独的氛围,营造了一个混乱、喧嚣、绝望的世界。

在马尔罗看来,人来到世上是一种偶然,人生充满痛苦,忍受种种屈辱与奴役,受命运的支配、摆布。在小说里,乔从心底产生的一种身为混血儿,被白种人所蔑视而感到深深的自卑;卡托夫永远难以忘却在西伯利亚被枪决所蒙受的莫大侮辱;对梅来说,作为一个被保护的女人活着而不能与所爱的人同归于尽,构成了她生命中最难以忍受的屈辱;柯尼希的仇恨来自于他在西伯利亚所遭受的伤害,他象牛犊、象女人一样哭泣;海墨里希烦恼的根源在于他无法象真正的男子那样生活所带来的耻辱。小说里所有人物,不管是压迫者或者被压迫者,人生在世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屈辱。这种屈辱是命运对人的戏弄。这些人物都能清醒地意识到屈辱是命运的基本要素之一。马尔罗总是把屈辱与监狱联系在一起。监狱集中体现了人的生存状况:人混杂地拥挤在一起,相互依赖,却感到格外孤独;人蒙受到耻辱和奴役。乔“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所处的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地位。”他同其他犯人一样“蒙受了一个受人摆布的人所能蒙受的一切耻辱,这种耻辱使他感到恶心——面对这个手持皮鞭的卑劣的身影无能为力,说明他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在监狱里,乔感觉到人的堕落和卑劣。这种卑劣首先是看守的凶狠,惨无人道地拷打犯人。“他觉得这种卑劣似乎是一种邪恶的命运,仿佛权力足以使几乎所有的人变成牲畜。麋集在栅栏后面那些令人不安的模糊身影,很象他童年时代所梦见过的那些巨大的甲壳虫与昆虫,他们就再不象人了。他们忍受着极端的孤独,天大的耻辱。”马尔罗在这里指出,首先是权力使人卑劣,使人变形,使人堕落。其次,这种卑劣来自潜藏在每个人下意识的虐待欲,即使是犯人本身也不例外。当看守在鞭打一个疯子时,“一声嘶哑的尖叫——充满痛苦和恐怖的尖叫,充斥了整个黑暗的牢房。”这时,有些犯人无动于衷,甚至还怂恿看守“狠狠地揍他一顿”。“人们竟忍心看着一个并不作恶、从声音判断无疑很年迈的疯子挨打,甚至纵容这种酷刑,这种现象使他(乔)产生了一种恐怖。”这个例子象征了人的生存状况的荒诞与恐怖。疯子是无辜的,却受到虐待,这难道不荒诞吗?作为同病相怜的犯人却怂恿看守毒打,这岂不感到恐怖?堕落加上虐待狂的欲望使刽子手毫无人性。

当然,犯人怂恿看守毒打疯子,除了人的潜意识的虐待欲外,另一原因是他们要疯子安静,因为人在走向死亡的大门前,表现出一种固有的恐惧感。犯人从难友的悲惨的结局看到自己难以逃脱的下场,清醒地了解命运的结局就是死亡。马尔罗在这本小说里进一步阐释了十八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关于人类处境的悲观哲学。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本书的实质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帕斯卡尔的思想。”帕斯卡尔这样说过:“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说人的状况的图景。”^⑤在这部小说的第六部分,“在大厅里——二百多名共产党伤员正在等人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拉

出去抛进火车头中活活烧死,后面的人从前面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这幅悲怆的场景难道不是两世纪前的帕斯卡尔哲学的绝妙的现代缩影?

耻辱就是丧失尊严。在乔看来,“对于一个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又不知道为什么工作的人,不可能有自尊心,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他的梦想就是“让所有被慢性瘟疫似的饥饿折磨致死的人具有自尊心。”乔、陈等共产党人就是要为恢复人的尊严而斗争,乔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有可能给那些与我共同战斗的人带来尊严。反对共产主义的东西,归根到底,都是不让他们得到尊严。”即便在死亡面前,乔和卡托夫并不是被动地等待死亡,他们要“否认虚无”,仍牢牢抓住人的自尊不放;最终,乔用身上的氰化钾结束了生命,认为“死亡是被动的,自杀才算得上自己的行动”。

四

在文本中,尊严与屈辱、人与命运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形式上,整部小说张弛变化,静动结合,先是节奏紧快的战斗场面,接着就是弛缓的哲理思辨;第一部分描写起义战斗的上海,接下去是静止被动的党中央所在地汉口。“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作者巧妙地将紧锣密鼓与丝竹之声交融起来,组成和谐的旋律。二元对立结构也表现在遣词造句上,与上面所述的节奏紧快的“原子短句”相对应的是行云流水的长句。当作者描写吉索尔哲理思辨或他吸鸦片以追求超脱时,句子冗长曲折。不过,小说风格的主调是明快的短句。这些短句好象有两种象征意义:除了象征孤独外,还象征着行动。人的行动在这部小说里首先表现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他们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志同道合,共同行动、战斗。他们的命运与贫穷苦难的人的命运紧紧相连。苦力的贫穷、妇女被奴役和那些“患溃瘍病、脊柱侧凸病以及食不果腹的人”的痛苦,他们的屈辱和任人摆布,促成了他们的革命的动机。贫穷伤害尊严,穷人是得不到应有的尊严的。在马尔罗看来,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给失去尊严的人恢复尊严,使被奴役的人们得到解放。革命是一种选择,它引导人们战胜命运,争回尊严。他们选择了革命,从而否定命运的孤独和死亡的虚无。乔的行动完全超越了个人的利益,他想:“人们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那一切,远远超出了自身的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要掌握这种命运,使它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对奴隶来说是为了基督教,对公民来说是为了国家,对工人来说是为了共产主义。”当世界如今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时,革命成了一种超越,代替了宗教。这些人选择了革命,团结战斗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

马尔罗对中国革命十分同情。当他创作时,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历史上最困难的“围剿”,被迫进行传奇式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马尔罗仍从中洞见到革命的希望,人类的前途。因为这种革命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对全人类都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小说的尾声,他这样写道:“革命刚刚经受一场可怕的疾病,但并没有夭折,是乔和他的同志们——不管他们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不管他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把革命传播到人间来了。”他们的死唤醒了千千万万陷在屈辱的泥沼中的人们。

① Roman Jakobson, *Questions de poétique*, Seuil, Paris, 1973.

②③ 林驥华等主编:《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 Jean-Pierre Richard, *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 Seuil, Paris, 1962.

⑤ 转引自柳鸣九等编:《马尔罗研究》。

(冯寿农、吴冰: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邮编:361005)